

沒有前者的發創之功就不會有後者葦葦之大觀；但是，比之《紅樓夢》貴族式的豪華典雅、脂粉氣撲面的纖巧哀怨，《金瓶梅》則多了一分平民化的質樸真實、狼氣十足的殘酷恐怖，二者是比肩而立、相映成趣，由此便有了與「紅學」相對的「金學」一說。因此，如果不獵奇式囿於感性的觀瞻，不道德性局於成說的討伐，不文學性限於人物或考據，而是從哲學的前形而上學的視域來解讀審視《金瓶梅》這一奇書，必定十分有趣。

一、人作為靈肉矛盾體的性、慾、情、愛的分析批判

《金瓶梅》兩類版本中，具有詩詞相配的版本謂之《金瓶梅詞話》^①，它更具藝術觀賞性。無論從文學的還是從哲學方面言，比之西方的名著，絲毫不遜色於薄伽丘的《十日談》、司湯達的《紅與黑》、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而今人所著的《廢都》可明顯看到《金瓶梅》的痕跡。如果超越了簡單的道德善惡評判，它講述了一定歷史情境中人的慾望及其實現的故事——使慾望的膨脹、擴張直至毀滅具象生動地用文字展現出來。上世紀80年代民間傳播甚廣的香港三級電視劇《金瓶梅》，則比文字更具象生動地展現了人性對於色慾的幻想、痴迷與貪婪，後來者大約無出其右。只是相比之於原著，所杜撰的武松與潘金蓮的愛情，與原著大異其趣，削去了原著的批判鋒

哲學的「前形而上學」視域中的

《金瓶梅》解讀與反思

張波 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摘要：明人小說《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獨創的非歷史演繹的話本小說。從哲學的「前形而上學」視域來解讀審視《金瓶梅》這一奇書，它生動地講述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一個關於人的性、慾、情、愛的故事。肉體獲得靈性才會有人性，只有讓靈與肉獲得和諧統一、以靈去統御肉，自然之性慾才會成長為人性之情愛，它才通之乎美達之乎善。該書作為活的社會存在的標本，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君主集權的等級制的男權宗法社會」的鮮明特徵，讓人看到權力崇拜與暴力崇拜所構成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底色。它預示了野蠻的不平等的反人性的權力結構及其社會制度必然會腐敗、必然要滅亡的命運。

關鍵詞：《金瓶梅》；人的自然性；人的社會性；社會存在

在有點文化的常人的印象中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一部淫書，但稍認真閱讀過、真正有文化的成年人則早已達成共識：它絕不是一部簡單的淫書。魯迅早就認為，它是一部「世情小說」，對其人情世俗的洞察評價頗高；毛澤東曾五評其書，把它當封建政治的反面教材來讀。從文學而言，它是第一部文人獨創的非歷史演繹的話本小說。如果說一部好的小說蘊藏了一個民族的秘史，就它所蘊藏的豐富的民族心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密碼而言，那麼它是被譽為封建社會百科全書《紅樓夢》的前奏，是可與曹雪芹《紅樓夢》比肩的「小紅樓」，

芒，迎合了常人自然感性的色情觀瞻、性幻想慾求，體現了港派風格，卻也過於離奇了。

人是生物進化到一定階段的個體生命，就像化石級的植物銀杏分為雌雄，就像大多數的開花結實類植物的花分為雌雄蕊，就像諸多哺乳類動物分為雌雄個體，人有男女個體之分。因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飲食男女成為自然之性。這種自然性是由自然進化造成，人類在自己的生存繁衍過程中難以擺脫的宿命。所有的宗教戒條——基督教與佛教，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禁慾主義的傾向被證明是違反人的自然性的。人類不可能戒除肉慾成為純粹的靈魂，人人不可能根除肉慾修成佛陀。如果根除了肉慾，將會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世界三大宗教原初之戒條，如佛教「五戒」——戒殺、盜、淫、妄語、飲酒，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誡」中的「不准姦淫」，並非要根除男女自然之慾，而是要防止肉慾的放縱無度；而伊斯蘭教則明確鼓勵成年男女婚嫁，並做出了諸多有益的限制。現代西方哲學中，佛洛伊德首創性發明「里比多」一詞，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論。其作為「里比多」的性力一詞，成為解釋人及其文化的原始性創造性力量。^[2]拉康的「鏡像理論」儘管解構了主體自我，認為主體是被建構起來的，但卻強調真正的心理學發端於「慾望」的揭示，「慾望」揭示了人真正的內在心理本質。^[3]

反觀《金瓶梅》一書，它生動地講述、思考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一個關於人的性、慾、情、愛的故事。它通過典型人物將基於性的快樂慾望的無限擴張予以表現——這個慾望不僅指性慾，還有與此相關的物慾、權勢慾。西門慶是一個青春年富、精力旺盛、體格強健、有錢有勢的男人，是一個基於性、貪於淫、爛於情、不乏愛、毀於慾的男人，集「酒、色、財、氣」於一身。作為故事演繹的主角，西門慶是男一號，參與演繹的還有諸多的男男女女，作為一群與男一號相對的女人中難分伯仲的則是吳月娘、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書名簡約為《金瓶梅》既反映了女性人物著力描繪的重點也反映了作者的道德評判，正是以這三個女人為代表的紅顏靚女與西門慶為代表的淫慾色魔相互為用，最終善惡有報、均不得善終。吳月娘則是淑女

賢妻的典範，崇奉佛法的代表，得以善終善報。西門慶作為男權社會的典型，其表現的是基於「性」的「慾」的追求與擴張，凡一切有姿色的女人與年少的美男都成為其性慾的對象，妻、妾、僕、婢、妓、偷，全部得以窮形盡相的表現。

西門慶的慾望是基於自然的——青春年富、精力旺盛、體格強健，他像諸多男人一樣具有強大的「里比多」，其性慾擴張具有自然的基礎與力量；它又是社會的——本來有錢有勢、通過巧取豪奪、越來越有錢有勢，其慾望滿足具有社會的基礎與能力；其父母早亡，沒有受到聖賢之書的教導與規約，而明後期本身傳統禮教遭受衝擊、並瓦解漸成時代潮流，人慾橫流、物慾橫流，社會大環境如此；因而造就出一個基於性、貪於淫、爛於情、毀於慾的市井男人典型——西門慶，實屬必然。而書中出現的諸多男人只是西門慶大大小小的影子。人必然是有慾望的，男女均有性慾望，但它的滿足與實現是在一定社會條件的基礎上進行的。拉康說得對，主體是被建構的。西門慶病態的畸形的瘋狂的慾望追求與擴張，是被病態的社會所建構起來的，人物的病態性格與行為反映的是社會體制的悖謬與乖張。從佛洛伊德人格理論看，西門慶的人格與行為還僅僅出於本我，停留於自我，而沒有升華到超我。他僅僅受快樂主義的本我所驅使，那個特定社會使其瘋狂也使其滅亡。他也讓人看到，人自然的慾望如果在特定的社會之中不受節制、而是提供條件、得以鼓勵與放縱，其慾望會瘋狂到何種程度，最終如何被慾望自身毀滅。

《金瓶梅》中的性、慾、情、愛，通過西門慶映現於諸男女身上，但其表現又具有鮮明的差別。在西門慶男權不受約束的前提下，西門慶之於吳月娘情愛為主、性慾居次，因此全書二人的赤裸的性描寫最少，一方面因其作為正室還具有家的觀念，一方面她篤信佛法還受因果報應等觀念的規約；其與李瓶兒起於性慾、達於情愛，特別是李瓶兒死後的厚葬及其愛屋及烏的表現可見一斑，一方面因其帶來了豐厚的家財，使其財勢大增，一方面則因其「好性兒」，不似潘六兒之心機多、歹毒苛刻，還因產子嗣為其脈續添希望，在這裏西門慶也閃現出更豐富的人性情愛的微光；其與潘金



蓮則始終是性慾與性慾的交鋒、碰撞、遊戲，春梅則是「小金蓮」，其不同之處多了一份情。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性描寫花樣翻新、窮形盡相、著墨最多，「醉鬧葡萄架」一節最具代表性。從性慾的擴張與滿足而言，西門慶殺夫奪妻為主動方，之後則潘金蓮為主動方，她可謂「女西門慶」，反映了女人對於性的病態慾求與無限擴張的願望與幻想，儘管西門慶與其性事頻度最高、烈度最強，她還屢屢勾搭僕人與女婿陳經濟，只是在男權社會中其慾望受到限制不能無限伸張罷了。她與西門慶的性交鋒中，最終殺死了他，在性慾望的較量中獲得勝利。單從性慾望而言，潘金蓮最盛，李瓶兒次之，吳月娘居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王六兒、書童、諸多妓女等，則是男權社會中西門慶這個有權勢的男人獵奇尋艷滿足其佔有慾、性幻想的性慾的調味品。它也印證了男權社會，女性對於男性必然的依賴性，女性作為可慾性對象則是其身體、性與生殖。西門慶死後，樹倒猢猻散，她們不得不尋找新的男人作為依靠。

柏拉圖的諸多對話，具有前形而上的鮮明特徵，它是文學的也是哲學的。在著名的《會飲》篇中，他借鮑薩尼亞之口表達了關於愛的善惡評判。鮑薩尼亞不同意將「情愛」「愛慾」一概加以讚美，而必須予以區分，即將「情愛」與「慾愛」、「愛與慾」加以區分。「情愛」是天上的愛神，「慾愛」是地上的愛神。在不同愛神的引導下，後者會導致荒淫、邪惡與肉體的享樂，他統治著下等人的情慾；前者則會導致陽剛、節制、純情、智慧、良善，她是高尚的人所追求的神。我們從一個人所追求的表現的行為的指向中，才能區分愛的善惡——情愛是善、慾愛則是惡。^[4]《金瓶梅》具有自然主義的敘事風格，性描寫成為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鮮明特色，也成為表現人物、傳達思想的介質，其性描寫時而赤裸時而還較為唯美，它既表現、確證了佛洛伊德理論，也體現了最自然的人慾的不自然性與文化性，即人在出於自然的性行為中能夠翻出如此多之花樣，在不同情境在不同對象身上表現出如此多之形態，真令別類高等動物應嘆其弗如！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各色男女感性的性觀瞻、性幻想的自然慾求。這也是儘管人們皆斥其為「淫

書」，但卻即使具有性經歷的成年人皆欲觀之的秘密所在。而各色從其改編的影視劇之所以隱秘而廣泛得以流傳，其原因也在此。因而，人的性行為不僅具有生產自身的慾求，而且具有滿足快樂的體驗慾求，這種快樂的體驗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生產自身原出於自然，但最終卻只成為性快樂的副產品。人即使再進化、再文明，其基底卻具有動物性、自然性，具有追求性快樂的慾求、願望。按佛洛伊德之說，它甚至發端於嬰兒期，是一種生命力的體現。成年人的性行為也是高等動物中不受時令等的限制，具有即時性。

但從其傾向而言，《金瓶梅》對於以西門慶與潘金蓮為代表的性慾望的無限追求與擴張、對人倫道德的敗壞，對於赤裸裸的快樂到死的行為，是批判否定的，對於情愛則是肯定的。二人的悲慘結局便是明證。二人均在年富之時暴亡，一為精盡衰竭痛苦而斃，一為武松殺仇剖腹挖心而暴屍街頭，其結局均不得善終。李瓶兒青春病亡，儘管不得善終，但卻喪葬極盛並被西門慶追懷，最終脫生豪門，也算是得以善終。春梅在西門慶死後做了守備夫人，她也分享了人生的富貴榮華，但在青春之時得「骨蒸」之疾而亡，不得善終但還不算悲慘。相反，吳月娘在西門慶死後經歷劫難卻得以善終。因此，人物結局作者都做了相差殊異、程度不同的描述，既反映了作者處理人物的一貫與仔細，也反映了作者的價值評判。儘管它具有佛教色空理論與因果報應說的色彩，但善惡評判卻表現出與柏拉圖的一致性。其關於性、慾、情、愛的價值評價，態度是鮮明的。如果有人大讚《金瓶梅》寫出「成人之美」或「人性之美」，片面稱道其性慾的病態表現，則是一葉障目、走火入魔，其還需仔細進化方可達致人性之文明境地。

瓦西列夫說得不錯：「在我們這個時代，認為肉體仿佛有罪的思想已經被人們永遠拋棄了。人的精神是同肉體作為統一物而存在的，它並不是感到有什麼罪過的綜合體。這種對立面的統一產生了和諧。」^[5]肉體獲得靈性才會有人性，只有讓靈與肉獲得和諧統一、以靈去統御肉，才会有真性情，自然之性慾才會成長為人性之情愛，它才通之乎美達之乎善。

二、作為野蠻的反人性的「社會存在」活標本的分析批判

「社會存在」就是人們的「社會生活」，它是隨著人們的生生死死在時間之流中的生存歷史。我們可以如歷史學家從器物、制度、風俗、理念去描述一個特定的社會歷史的時間性之在，我們可以如海德格爾抽象地描畫社會存在如何在時間之中「在起來」並成為「此在」，我們可以像馬克思那樣揭示社會存在的法則並將其劃分為不同的社會形態。這些方式具有傳統的形而上的特徵。文學具有「前形而上學」的「思」的特徵，一部傑出的小說常常拋去了形而上的抽象性，讓人們如此真切經驗地感知、思考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生活」，它是活的「社會存在」的標本。通過對它的具象的感知與思索，我們可以獲得傳統形而上學所不具備的「前形而上學」的哲學之思。

《金瓶梅》成書於明代隆慶二年至萬曆三十年，即公元1568—1602年。它從《水滸》中的一個片段—武松景陽岡打虎寫起，進行獨立的演繹，似乎寫的是宋代的事，實際寫的是明代的社會生活。

「作者通過西門慶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在社會上活動的脈絡，描寫了上自宮廷間皇帝身邊的為非作歹的宦官和朝廷上擅權專政的太師，下至在市井間招搖撞騙、蠻橫狡詐的幫閑篋片和地痞流氓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狀態。通過這些人物的卑鄙行為和罪惡活動，作者細緻地勾勒出來一副陰森殘酷的鬼域世界的輪廓。」^[6]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存在既是正德以後至萬曆中期明代社會的生動寫照，也是君主集權的等級社會腐朽之後活的人們社會生活的標本。

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君主集權的等級制的男權宗法社會」，是其鮮明的特徵。它是君主集權專治的，名義上在君主之上還有一個「天」或「天帝」

「天命」，但實際上君主男權在國家治理中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即使是那些逆臣叛黨也需借助的權威，否則謂之「變天」。他不僅處於世俗權力的最高等級，也是宗教的具有代天帝治理天下、奉天承運、教化萬民、作為道德典範的被神聖化的天帝之子，是人世間集世俗權力與神聖權力於一身的

無上權威。他是最有權力的男人。傳統社會是等級制的，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妻權力不平等，此「三綱」之謂，前者為「乾」後者為「坤」，因而「乾綱獨斷」。其生享獨斷之權，死而祭之於宗廟，書之於史人們還必須對其行為「諱」，所謂「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父權制宗法社會本身等級分明，其等級次序不容逾越。其延伸於女人，在家國之體制中也等級分明。它與官僚等級的制度相混合，形成「君主集權的等級制的男權宗法社會」，它成為家國統一體的秩序模型。傳統社會作為集權社會的家國統一體，是一個怪異的集合體。其生成於男權宗法的家庭，完善於官僚等級的國家。

因此，在傳統社會中，在家庭中男子渴望成長為父親，擁有乾綱獨斷的權力，以無限擴張其慾望；在社會中男人們則渴望上升到官僚等級制的更高等級、以至最高等級—天子，才真正具有縱橫天下、為所欲為的權力。在家庭中女子成為道具與陪襯—但也等級分明，成為男權得以確證的對象，妻妾成群是一種榮耀與權力的象徵。反過來，妻妾爭寵、爭奪交配權，獲得子嗣則成為女性權力爭鬥與權利獲得的中心。前者是正劇，後者則是與之相交織的副劇，但同樣充滿機謀盤算、刀光血影。權力的等級與權利的獲得在國與家之中是相匹配的，更高等級的權力意味著更大權利的獲得。因此，吳思在金庸武俠小說中讀出了作為男人童話—「中國男人的改良皇帝夢」，讀出了「暴力的幻想」。^[7]因此，權力崇拜與暴力崇拜構成中國社會傳統文化的底色。男人們崇拜權力、渴望獲得社會權力的更高等級、成為俗語所言的「人上人」，其常態的吃苦耐勞「吃得苦中苦」（科舉）、其非常態的通過暴力（戰功），便成為獲得權力、晉身更高權力等級的階梯。其副產品則是「黃金屋」（財貨）「顏如玉」（美色）。而在家中，女人依附於更有權勢的男人、妾成為正室、婢成為妾則視為一種榮耀，也更有權力與權利。傳統社會的鮮明特徵與文化底色，通過《金瓶梅》一書可得到具體生動豐富的感知。

西門慶一出場在家庭中，已經成為父親與一家之主的男人，在家中具有了乾綱獨斷的權力，其權力的表現與權利的獲得，體現在對於女人的佔



有及其性幻想慾望的擴張與滿足，體現在可以不受約束地對於財富的支配與揮霍。儘管已有三房女人——吳月娘、李嬌兒、孫雪娥，他依然可以巧取孟玉樓、殺奪潘金蓮，並行走於青樓妓院。但是，在社會權力等級的結構中他最初是一個依靠資財與地方官僚相勾結、依靠社會黑惡勢力、處於權力邊緣的角色，他只是間接地通過兒女親家與官僚階層相勾結；隨著他的苦心經營與投機、賄結蔡太師與社會高層的政治權力掛上鉤，由「白身」布衣升為清河縣副提刑官、再升為正提刑官，晉身於官僚權力更高的等級之中，隨著他在權力體系中不斷擴大聯絡、廣通人脈，他不但讓移情別戀蔣竹山的李瓶兒主動投入其懷抱，而且其財富也得以在官商勾結中迅速擴張，在作為官僚一份子所具有的「合法的傷害權」^[8]中獲得財富與尊榮，並為所慾為地擴展、滿足對於各色女人的慾望與幻想。

「淫器包」與「胡僧藥」均為增強其性慾望滿足的手段，可以看作是寫實的。但是，它也可以看作是具有象徵意味的。前者是男權社會中男性權力對於女性具有的威權象徵，以此才能夠支配、駕馭、征服女性，使其臣服於男性的威權之下。「胡僧藥」則是在西門慶獲得等級制的權力之後所獲得的性藥。胡僧不僅告知其用藥之法，且告誡其不可多用、濫用。因此，它具有社會政治權力象徵之意味。權力是一種社會性的支配力，無論對於個人與社會整體，運用適當加以節制則有益，濫用、無節制「私用」則貽害無窮。但是，專制的等級的權力必然導致其不受節制的濫用、「私用」。西門慶將其無節制地濫用於各色女人以滿足其「私慾」，最終潘金蓮在其醉夢之中使其最徹底加以濫用，在其醉夢之中——在其沉迷於權力的濫用與追求之中、在其沉迷於征服女人的幻想之中，導致其最終的滅亡。

因此，「淫器包」與「胡僧藥」就不是作者實寫的簡單的性慾望滿足的增大器與增強劑，在其背後有其深刻的象徵意味。如果將西門慶這個人物與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相聯繫，認為其暗寫的是這個站在等級權力的頂峰、濫用權力、荒淫無度的皇帝，則對於專制的等級的權力的象徵與批判的意味更明確、更深刻，這個專制的遭濫用的

權力——專治等級制的最高男權，像西門慶這個人物壯年而亡一樣，必然要被自身所毀滅。野蠻的不平等的反人性的權力結構及其社會制度必然會腐敗、必然要滅亡。是否我們對《金瓶梅》相關描述，進行了過渡的詮釋？只要讀一讀黃宗義的《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一文，對於專治等級的君主制激烈批判的文字，就會知道明代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社會認知的高度與深度，就會知道《金瓶梅》的作者與黃宗義的批判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關於中國傳統社會歷史，魯迅曾在《燈下漫筆》文中一針見血指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掙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所謂天下太平，便是「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任憑學者如何鋪張，真實的歷史「有其更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歷史的一治一亂。^[9]這是一個集權專治等級的人與人相殘食的社會，其綱常禮教使其獲得超穩定性。其中不乏改朝換代，但社會制度卻如車輪一般周而復始，並無革命性改變。這種通過暴力獲得的權力，在其獲得的過程中是至上而下的軍事組織與命令方式，在其獲得之後便按照至上而下的命令方式組織分配權力，從而形成金字塔的權力模式。其獲得權力通過暴力，其維護權力也依憑暴力，並將金字塔式的等級模式轉化為權力統治模式與權利的分享模式。當王朝初建之時，統治者還對前代統治覆亡的鑒戒記憶猶新，還能夠勵精圖治、以保障「民」的基本生存；隨時間的推移，後代統治者模糊遺忘了前車之鑒，其集權等級的權力集團必借助暴力無限擴張其權利與權力，為追求私利、滿足私慾、而上下勾結、濫用權力、終於形成牢固的利益鏈，最終導致人民至下而上的揭竿而起、重新改朝換代。這就是中國社會歷史「一治一亂」「分而合、合而分」的面相與表像。它背後起支配作用的是作為體制的權力模式。

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歷史中，「民為邦本」「民貴君輕」是一個擺在桌面的明規則，其真實的運行則按照一套「潛規則」行事：「在中國歷史上

的帝國時代，管理集團極為引人注目。這個社會集團壟斷了暴力，掌握著法律，控制了巨額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的命運。」^[10]作為統治者的官僚等級集團，當欲獲取權力之時，人民被抬高與驅使，當權力獲得之時，分配權力、分享權利之時，人民則重新落入權力與權利等級的底層，其權力被有組織的以暴力為後盾的官僚集團支配、剝奪，其權利任處於上層官僚等級集團剝奪與踐踏，人民永遠處於魯迅所言的被奴役的奴隸地位，從未獲得做人的權力與自由平等的權利。如幾千年前老子所言，人民是「芻狗」，這用草扎成的狗先貢之於祭壇、完事後則被隨意踐踏。這一被吳思稱為「官家社會」「官家主義」的中國傳統社會，就是「君主集權的等級制的男權宗法社會」。所有男人在君主面前均是奴才，在等級制的層層等級中，低位的男人則是高位男人的奴才，女人則是受男人慾望支配的奴隸。普通勞動大眾的「民」，既沒有獲得平等的權力也沒有享受平等的權利，卻被「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民本謊言所欺騙，實際上則是「君貴民輕」「官為邦本」「官貴民輕」。當「草民」正當的權力與權利受到侵害試圖得以伸張，並觸犯了官家的權力與利益，輕則當作玩虐刁民予以刑罰，重則當作亂臣賊子予以剿滅。因此，不要不學無術廉價禮讚「民本」，如何實現民主，人民——特別是中下層勞動者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男人與女人平等地擁有權力、享受權利，創建出一套從下而上的制度體系以保障落實民主，舊歷史的悲劇才不會在「一治一亂」中一再重演。

三、餘論

我們從人的性、慾、情、愛與社會存在活的標本雙向度，對《金瓶梅》予以思考、剖析與批判。作為一定時代的人性與社會體制是相互支撐匹配的。它可感知與思考的內容還很多，如從文化上而言中國文化深層具有的「身體化、口腔化」傾向，從人際關係而言情感主導的「講情而不講理」的傾向。如果將古人所寫的《金瓶梅》與今人所寫的《廢都》進行比照閱讀，會發現更為瞠目的內容，也更發人深省、令人深思。諸多人當代對傳統文化

予以激情的頌揚，但從《金瓶梅》的解讀與反思之中，我們是否多了一個維度——一個真正冷靜的批判的前形而上學的哲思之維。

從《金瓶梅》成書到現在約400年多一點，那個時代離我們並不遙遠。從帝制覆亡距今也就100年多一點。而我們傳統的民族性及其社會歷史，如果從孔夫子算起有2500年之多。1919年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救亡圖存還是民族的第一要務。國民性及其文化改造的任務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而那位人所熟知的新中國的締造者不惜年邁與眾人反對，要讓文化來一個徹底的革命，要從民族的文化深處來一場徹底的變革，讓中國真正「新」起來，其具體的展開可圈點之處甚多，但作為深通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對明史有深入研究的思想家，其中是否蘊藏著其常人所看不透的玄機，也大可值得深思。有一點可肯定，一旦《金瓶梅》中的人物與故事在現實中復活，則說明傳統文化不僅源遠流長，且傳統社會的權力結構與觀念根深蒂固，我們不可不慎思之也。黃炎培當年在延安窯洞論及的「歷史周期率」，既如黃鐘大呂重新響起，也依然是一道需待破解的謎題。否則，無論我們的物質如何發達，GDP排序如何突飛猛進，我們的社會依然可能會陷於歷史周期率的惡性循環。

參考文獻：

- [1] 盛寧：《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6月北京第1版）。
- [2]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 [3]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 [4] 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 [5] 柏拉圖，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1版）。
- [6] 拉康，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1月第1版）。
- [7] 馬丁·海德格爾，孫周興譯：《林中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 [8]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夏鎮平、宋建平譯：



《哲學解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

[9]張波：《在哲學與馬克思理論之間》(陝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7月第1版)。

注釋：

[1]蘭陵笑笑生，梅節校：《金瓶梅詞話》(香港道風書社)。

[2]佛洛伊德，林塵、張喚民、陳偉奇譯：《佛洛伊德後期著作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6年6月第1版)，參閱「自我與本我」一文。

[3]拉康，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三聯書店, 2001年1月第1版)。參閱「主體的傾覆和在佛洛伊德無意識中的慾望辯證法」一文。

[4]柏拉圖，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1版)，參閱216-222頁。

[5]瓦西列夫，趙永穆、范國恩、陳行慧譯：《情愛論》(北京：三聯書店, 1984年10月1版)，第9頁。

[6]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三)(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年版)，第954頁。

[7]吳思：《血酬定律》(語文出版社出版, 2009年4月第1版)，參閱「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麼夢」一文。

[8]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參閱「身懷利器」一文。

[9]張明高、範橋選編：《魯迅散文選》第一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2年2月第1版)，第433-434頁。

[10]「潛規則」一詞，由吳思先生發明，關於其詳細的精彩的闡發，可參閱其大作《潛規則——中

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引文見「修訂版序言」。

Interpreting and Reflecting for The Golden Lotu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e-Metaphysics” of Philosophy

Zhang Bo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Golden Lotus, which was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first non-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story-telling and scholars' original creation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pre-metaphysics” of philosophical, The Golden Lotus shows us vividly that it was a masterpiece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human's sex, desire, emotion and love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body will become humanity after achieving spiritually, using the way to combine with the spirituality and the body harmoniously, and allowing the spirituality to get the leadership of the body, then the desire of the sex will change into the love of human nature and finally turn to be perfect and goodness. As a specimen of living social existence, The Golden Lotus not only reflect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le-dominated patriarchal society of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monarchy of ancient China”, but also shows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was composed by the worship of power and violence. Furthermore, it indicates that the destiny of power structure and social system which was barbarous, unequal and anti-human, h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to corruption and perdition.

Key Words: the Golden Lotus, Human nature, human sociality, Social existence